



Annual Report of
Cultural Studies

文化研究 年度报告

(2010)

● 陶东风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Annual Report of
Cultural Studies

文化研究 年度报告

(2010)

● 陶东风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研究年度报告. 2010 / 陶东风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 - 7 - 5097 - 2466 - 8

I. ①文… II. ①陶… III. ①文化研究 - 研究报告 - 中国 - 2010 IV. ①G0 - 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8270 号

文化研究年度报告 (2010)

主 编 / 陶东风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责任编辑 / 周志静 孙以年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责任校对 / 白云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张晓莉

责任印制 / 岳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2.75

版 次 /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字 数 / 369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466 - 8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文化研究年度报告（2010）

主 编 陶东风

副主编 邱运华 王德胜 宋月华

执行编辑 胡疆锋

主办 北京文化战略研究院

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学术委员会（按姓氏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陈光兴 高丙中 黄卓越 鲁晓鹏 陆 扬

罗 钢 汪民安 王 宁 王晓路 王小明

徐 贲 张英进 赵 勇 周 宪

外国学者：

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英国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 UK）

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英国桑德兰大学（University of Sunderland, UK）

西蒙·杜林（Simon During），美国霍普金斯大学（University of John Hopkins, USA）

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ustralia）

约翰·阿米蒂奇（John Armitage），英国诺桑比亚大学（Northumbria University, UK）

主编的话

《文化研究年度报告（2010）》已经编辑完毕，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文化研究是当今世界备受瞩目的前沿学术领域，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诞生于英国起，已历经 50 余年的发展。其间，它四处出击，敞开怀抱吸纳各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和方法，积极介入当代文化与学术政治，成为目前国际学术界最具活力和创造性，也最具争议性的学术思潮之一。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文化研究思潮涌入中国大陆，立即对人文社会科学及其知识生产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重构了知识分子的话语方式。最近几年，文化研究不仅形成浩大的声势，进入高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而且将自己的方法、立场和旨趣逐渐渗透到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各个分支之中，可谓四处播种，遍地开花。

为了及时反映文化研究的研究现状和最新进展，我们决定从 2010 年开始出版《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报告”主要由三大板块组成。

第一个板块为“文化研究年度文选”，精选国内期刊上发表的、我们认为能够代表文化研究学术水准的论文。这是“报告”中分量最重的板块。

第二个板块为“文化研究工作坊”。该板块参照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社会学工作坊》，意在探索一种工艺，力求展现一个产品（研究成果）的生产过程、生产机制、生产环节、生产技术，而不仅仅是把产品（研究成果）呈现出来，就像带人参观一个制作工艺的流程。因此，这个板块除了发表一些我们认为是重量级的研究成果（可以是学术论文，也可以是有价值的原创性调研报告和民族志访谈）外，还希望作者尽量细致地“交代”自己的研究过程（选题缘起、收集材料、调查研究、写作进展、修改加工等）涉及的各个环节。

本期我们发表的是贵州师范大学副教授、复旦大学博士后林早关于世博

园空间研究的成果，其中还包括她和合作导师陆扬教授在该课题研究过程中的多次交往，让我们仿佛听到、看到了师徒在工作坊中切磋技艺的声影。

第三个板块为“信息与资料”。该板块又由几部分组成。

（1）文化研究大事记。辑录、整理本年度国内外文化研究领域影响大、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与史料价值的重大事件，如文化研究重要机构的成立及其活动，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会议、发表的重要论文等。我们希望收录除了中国大陆以外，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有关文化研究的大事。但是因为本辑年度报告编得比较匆忙，大陆以外只有徐海龙写的关于美国文化研究年度情况的介绍。这是本人感到非常遗憾的，希望下辑能够弥补这个缺憾。

（2）文化现象扫描。主要是按照时间线索记录一年内发生的热点文化现象，以具有知名度、流行度的大众文化现象为主。正如本书编者之一陈国战交代的：“我们此处所使用的‘文化’概念，取的是其广义上的内涵，也就是雷蒙·威廉斯所说的‘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因而，在我们选取的10个文化热点中，不仅包括娱乐文化、新版红楼等大众文化事件，而且还涵盖了红卫兵道歉、微博等与狭义的‘文化’关系不大的事件。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力图在全面呈现各方观点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分析，而我们的分析方法是典型的文化研究式的，即坚持一种政治学志趣和批判性取向。在此指导下，我们试图勾画出文化研究视野下的年度文化地形图。”

（3）文化研究重要著述介绍。这部分主要介绍本年度重要的文化研究著作，兼及大陆本土学者的原创性著作和翻译介绍的西方著作，但目前仅限于中文著作，暂不涉及中文之外的著作。

当年的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曾经出版过自己的工作论文和工作报告，产生了重大影响。本人希望《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既是年度文化和文化研究的工作总结和资料汇编，又是文化研究工作者切磋技艺、交流经验的工作坊。我们诚挚地邀请有兴趣的朋友们加入我们的文化研究队伍，大家一起为它添砖加瓦。

陶东风

2011年3月12日

目 录

文化研究年度文选

- 3 | 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
——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 / 王 晓 明
- 17 | 文化研究的全球播散与多元性 / 徐 德 林
- 32 | 扮装政治、弱者抵抗和“敢曝（camp）美学” / 徐 贵
- 54 | 传媒文化：做什么与怎么做 / 周 宪
- 65 | BBS、博客、粉丝与书商
——《明朝那些事儿》的生产元素 / 赵 勇
- 81 | 寻找新的文化认同：今日中国软实力和传媒文化 / 刘 康
- 93 | 新媒介与青年亚文化转向 / 马中红
- 107 | “气场”到哪儿去了？
——对文化研究及新自由主义的反思 / 徐 钢著 曹雷雨译
- 125 | “生活政治”和“微观权力”的浮现
——论日常生活与新写实小说的政治性 / 陈小碧
- 137 | 理论同一性之梦的破灭
——关于《关键词》们的关键问题的反思 / 冯黎明
- 150 | 是文化，还是政治：审视海外华人学者的文化研究 / 陈林侠
- 163 | 英国文化研究中的亚文化研究谱系 / 李政亮
- 177 | 重申文化研究 / 陆 扬
- 183 | 重建上海的“现代性”：一份杂志与它的“城市” / 曾一果

- 197 | 遭遇特洛伊木马
——《百家讲坛》与电视知识分子 / 罗四翎
- 209 | 从“娱乐”到“傻乐”
——论中国大众文化的去政治化 / 周志强
- 224 | 从文学理论到文化研究 / 陶东风

文化研究工作坊

- 245 | “阿莱夫”空间与城市的故事
——上海世博空间研究 / 林 早
- 271 | 附录 空间、过程及其他
——上海世博文化研究个案写作过程 / 林 早

信息与资料

- 285 | 2010 年文化研究与文艺学学科大事记 / 王小明 祁林等供稿
孟汇荣 胡疆锋整理
- 290 | 文化场中的权力博弈
——2010 年文化热点评述 / 陈国战
- 318 | 2010 年文化研究重要著述评述 / 吕鹤颖 蒋 磊
- 340 | 2010 年美国文化研究大事记 / 徐海龙

文化研究年度文选

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

——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

王晓明*

在中国大陆，作为一种成规模的学术和思想运动，文化研究是在 1990 年代末和 2000 年代初才真正开展起来的^①，比起香港和台湾，至少晚了十年。但它一展开，势头就很明显，到 2004 年，全国许多大学，尤其是北京、上海两地的大学，纷纷开设讲座、课程，出版欧美文化研究著作的中文译本，拟定研究计划，建立专门的研究和教学机构，形成了一股“文化研究热”。这个“热”至今仍在延续。

为什么会如此？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学术/学院体制运转的需要，二是——更重要的——社会现实的刺激。

就第一方面来说，从 1980 年代早期开始，中国的学术/学院体制就形成了追逐欧美学术潮流的特点^②，这个特点到了 1990 年代中期以后膨胀得更为严重。而在这个时候，文化研究是唯一一种在欧美已经成为“显学”而国内尚无系统介绍的“新”的学术资源，因此，无论对于学院知识生产，

* 王晓明（1955~），男，上海人。上海大学文学院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1990 年代中期，就有个别敏锐的学者（如戴锦华）开始用类似文化研究的方法展开对电影和都市流行文化的分析，亦有学者（如李陀）公开提倡文化研究，但这些努力在当时没有引起广泛的呼应。

② 尽管在 19 世纪晚期中国学术界已经开始“西风东渐”，但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这股“西风”的范围始终比较宽大，并不仅指欧美。50 年代初，中国学术界更一度形成排斥欧美、专学苏俄的风气。

还是对于谋取话语权的学术政治，它都显得非常重要，成为学者关注、引进和模仿的对象。

第二方面的原因，要复杂一些。

经过 20 年的“改革”，中国社会——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变化巨大，面目全非。这在人文学者和研究社会文化的社会科学学者中间，引起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消费社会和大众文化时代，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中的主导力量，因此，需要引入——主要是 1970 年代以后的美国式的——文化研究的理论，通过文化研究来确认这个新的现实。

另一部分人却没有上述这样的确信。相反，他们对社会的剧变满怀疑惑：中国的确是和 1950 ~ 1970 年代完全不同了，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明显不再是先前那样的“社会主义”社会了。可是，最近 20 年来，中国并没有向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靠近多少，而是正在向某个以人类目前的知识尚难以确认的方向滑去。中国正在向何处去？它将会变得怎样？如此变化的中国又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这些大问题，这一部分人深感困惑。

因为这些困惑，这一部分人就：①对中国的现实和前景不敢抱乐观态度，而更倾向于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现实；②觉得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开展对当代社会现实的研究，只有通过这样的研究，才可能获得对社会剧变的理解；③认定此种研究必须跨越现有的学科界限，不但要从整体上分析文化现实，而且必须将文化和与之在地结合在政治、经济等其他因素联系起来分析。

正是上述情形，将这一部分人的眼光引向了 1960 年代伯明翰学派式的文化研究。他们实际想做的，是一种批判性的分析，但在今日中国的特殊情形下，他们不但需要新的思想资源^①，也需要新的名义。主要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他们觉得可以借用“文化研究”来给自己命名。也因此，他们对 1990 年代在美国成为“显学”的那种过分学院化、因而日渐丧失社会影响力的“美国式”文化研究相当警惕，他们不希望自己最后变成那个样子。

① 中国知识界在 1980 年代习得的那些机械两分式的理论思路，例如现代/传统、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等等，此时都已基本失效。

笔者本人即属于这一部分困惑的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上海，文化研究的研究、教学和与之配套的学院建制活动相继展开。

2001年，上海大学成立了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文化研究机构。其后的4年间，上海各大学陆续建立了类似的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吸收了来自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传媒研究和电影研究等方面的有志于文化研究的学者，其人员亦互有交叉。例如，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E研究院的部分文化研究人员，就来自于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后者则除了上海大学本校的专职研究人员之外，还吸收了十余位来自上海其他大学和研究所的学者，担任兼职研究员。

上述研究机构都开展了各自的研究项目。其中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的研究计划，规模最大。2003年，该中心展开了一个为期5年、总名为“1990年代上海地区文化分析”的研究计划，包括8个项目。^①2008年，该中心又展开一个为期10年，规模更大的研究计划，它以“当代文化生产机制分析”为总名，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新的支配性文化的生产机制分析”，二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问题分析”。

虽然在欧美和一部分亚洲地区（例如日本和韩国），文化研究每每不愿皈依现有的学院体制，但在中国大陆，文化研究却迫切需要在大学里开辟自己的教学空间。^②在上海，从1999年开始，多所大学^③相继开设了针对高年级本科生的文化研究选修课。2002和2003年，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和中文系相继开始招收以文化研究为课程方向的博士生。2004年，上海大学成立文化研究系，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专门的文化研究教学机构。

2006年，5所大学/研究所（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文化研究学者联合设立了

① 它们分别涉及媒体（电视）、房地产市场和广告、街道的视觉形象、工人新村、工厂和工人的文化史、文学网站、都市新空间、流行服装等方面。这些研究的成果，已经从2008年初开始，以单行本的方式，作为该中心主持的“热风”书系（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一部分，陆续问世。

② 本文第二部分会说明这方面的主要原因，这里先列出一个次要的原因：与文化研究的巨大任务相比，目前中国大陆（包括上海、北京等文化研究相对活跃的地区）能有效参与文化研究的年轻人太少，而大学教育无疑是培养此种人才的有效途径。

③ 如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和同济大学。

一个跨校/院的文化研究硕士联合课程，该课程由多门课程组成^①，延续至今。

上述这些课程都在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网站（www.cul-studies.com）上分别开辟了专门的课程讨论区，以方便师生和其他地区对文化研究有兴趣的网友交流感想。

范围更大的联合教学及相关的交流计划，也在陆续展开。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2007年，该系举办以“中文世界的文化研究”为题目的暑期讨论班。^② 2008和2009年，该系与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连续组织双方博士生的对谈活动。从2010年开始，该系将参加以“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为总题的亚洲文化研究联合课程；并举办以“文化研究方法论”为题的暑期研讨班。^③

但是，同时上述这些活动也引发了一系列具体实践和理论思考的困难，或者说难题。下面笔者选择其中三项，仍然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教学实践为例，依次介绍，求教于各位同道。

二 文化研究与大学体制

从某种意义上讲，反体制是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场之一。可是，在目前的中国，依然是政府独大的集权体制，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资源，都在体制以内。因此，如果不进入现行的大学体制，不向这个体制借力（信息渠道、经费等），文化研究可以说根本就开展不起来。

更重要的是，越是成熟的现代社会，学校教育的作用就越大，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对学校教育的影响，也可能更为深刻。今日中国，低收入阶层子弟所遭受的智力损害，已经使学校教育成为在人身上复制——而不是

① 目前已经讲授的课程有：“文学/影视文本分析”、“文化研究理论专书选读”、“中国社会主义文化问题”和“改革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等，由上述5所大学/研究所的文化研究学者轮流讲授。计划讲授的课程是：“中国现代思想文选”、“当代支配性文化分析”和“文化研究方法”。

② 该讨论班邀请来自北京、香港、台湾和上海的11位资深的文化研究学者，以5天时间，与来自香港、台湾和大陆各地大学的30余位青年教师和博士生座谈。该讨论班的报告集，作为一种教学参考书，于2010年在上海出版。

③ 该讨论班以中国大陆各地大学中讲授文化研究课程的青年教师为对象。

打破——现存社会的不平等结构的主要场所。^①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研究岂能不介入大学教育，而放弃对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社会未来的领域的争夺？

但是，风险也必须考虑：你想借体制之力，但体制有它的要求。随着文化研究逐渐进入大学，开课建系，它会不会也和譬如 30 年前的“比较文学”一样，逐渐丧失社会批判和社会实践的活力，成为一个僵硬的学科？

我们现在的做法是：充分意识到上述风险的严重，在硬着头皮挤入现行大学体制^②的同时，尽可能开拓和保持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2004 年组建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时候，我们明确强调一个原则：文化研究并非一门如“中国现代文学”那样的专业（discipline），而可以说是一种看待文化和社会的思想方法（approach），一种不受狭隘专业限制的开阔的视野。

我们尝试用各种方法来落实上述原则。

首先，不组建文化研究的学士学位课程，只提供本科选修课。^③ 我们鼓励学生在完整地接受了某个专业的系统知识训练之后，再来修读文化研究的课程。

其次，虽然设立文化研究的研究生学位课程，但无论硕士还是博士课程，都只是组成一个研究方向——而非一整个专业，隶属于其他专业。^④ 从 2008 年开始，我们又开设一门作为必修课、可覆盖多个专业的一年级硕士

① 例如，就文学教育而言，在 1980 年代突出地发挥了培养批判性思维的效用的“中国现代文学”、“文艺学”和“比较文学”等学科的教学，在 1990 年代相继变得循规蹈矩、死气沉沉。此种情形，其他领域也多有发生。而与此同时，那种认为读大学就是拿文凭、谋取高薪行业的入场券的看法，在大学校园内愈益流行。更令人惊心的是，199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学费高涨、强调“素质教育”等一系列因素的膨胀，贫寒子弟进入大学的道路越来越窄。

② 这并不容易，时至今日，中国教育部的一级学科目录，依然没有将“文化研究”列入其中。

③ 此类选修课共有 3 门：“文化研究导论”、“文化研究理论选讲”和“文化研究的方法 and 实践”，都是针对 3、4 年级本科生。从 2009 年开始，另一种针对所有年级本科生的“文化研究导论”被列为上海大学文学院本科选修的 4 门专业课之一。由于每个学生只需在此 4 门课中任选 2 门，此课仍保留相当大的选修性质。

④ 在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提供的硕士学位课程先后隶属于 5 个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人类学”、“电影电视艺术学”和“传播学”；博士学位课程则先后隶属于“社会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

生的文化研究导论课^①，这实际是将文化研究的入门课程设立为一种“通识”课程。以后，我们还会在研究生课程方面尝试更多的安排，促使已经修读研究生课程的学生，继续跨越单一的专业教育。

再次，与课程的“跨学科”相配合，文化研究系只组建一个规模很小的专职教师编制；^②作为系的最高机构的系务委员会，其11位成员（包括系主任），则分别来自校内的其他5个机构：中文系、社会学系、影视艺术系、传媒系和知识产权学院。我们希望能用这样的制度，克服文化研究的体制化教学所必然会孕育的专业化倾向。

最后，是不断推动文化研究的教学跨越大学的围墙，进入广阔的社会空间。除了上节介绍的组建跨校联合硕士课程和参与“Inter - Asia”多国（地区）联合研究生课程等之外，最有发展潜力的是“当代文化研究网”上的文化研究课程讨论区。目前（2009年）在这个讨论区里有来自各大学（不只是上海大学）的7门包含不同年级（主要是面向研究生，也有面向高年级本科生）的文化研究课程^③，每一门课程都有一个单独的BBS讨论区。而这些BBS里的精彩的讨论，则会及时转移到网站的主要论坛（“热风”）上，接受更广泛的阅读和评议。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将个别学校的文化研究教学与理论上是全球性的读者的参与结合起来，应该是能增强文化研究教学的开放性的。

以上所说，都是教学制度上的安排。但是，这些安排并不能完全解决一个更为棘手的难题：要在大学里开拓一个文化研究的独立空间，必须先替文化研究挣得一个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而要说文化研究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必须确定它有自己专门的、从其他学科的窗口望不见的研究对象，以及相应的分析理论和方法。单说它是一个approach，显然不够。在笔者看来，这可能是现行的大学体制最厉害的一招，它强迫我们构造文化

① 譬如对中文系的5个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文艺学”、“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1年级硕士生开设“文化研究与中国现代性问题”通识课。

② 截至2009年9月，该系仅有3位专职教师，其博士学位分别是“文学”、“社会学”和“性别研究”。

③ 这个讨论区里的课程会随着实际授课情形的变化而增减。主讲教师一般都会将授课大纲、阅读书目等贴进其课程的讨论区（有些教师还会陆续贴进其授课讲义）。学生所贴的，大多是课后的感想（包括疑问），以及部分阅读书目的电子文档。

研究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学科内容。^①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为文化研究确定一种具有双重效应的学科内容，它既能——至少是部分地——满足大学体制对独立学科的形式要求，又能保存甚至发展冲破这种形式藩篱的能量。在这方面，我们目前的努力集中在如下两点：

第一，确定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基本对象。最近30年社会剧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形成了一种与譬如1950~1970年代的“毛泽东思想”完全不同的新的支配性文化。凭借一套深具特色的形成、运转和传播机制，它差不多充满了从价值观念到物质生活的各个层面，因而成为整个社会再生产的重要途径。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新的支配性文化与1950~1970年代的那一段“社会主义”历史的关系。如果没有后者，很难想象今天中国会形成前者，在某种意义上，前者正是后者的产物；另外，前者一项关键的功能，就在于支配大众对后者的认识，从这个角度看，今日“活”在无数中国人头脑中的那一段历史，又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新的支配性文化的产物。

正是基于如上这些认识，我们将“当代支配性文化的生产机制”，以及这个文化与那一段“社会主义”历史的相互生产的关系，确定为今日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我们深信，这样的研究对象，或者说它的完整的轮廓，是只有从我们所理解的文化研究的窗口，才能看清楚，甚至不妨说，正是文化研究的这一扇窗户，才能令这些对象成形。当然，我们更深信，这样的研究对象，是任何自囿于单一学科（包括文化研究）的研究者所无法洞悉的，我们只有不断逾越学科边界，向其他已有或新创的研究思路借力，才可能真正推进自己的认识。

第二，勾勒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方法论轮廓。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的根本目的，不仅是批判性地分析社会的文化状况及其背后的压迫性机制；它还有另一个至少同样重要的使命，那就是促进社会和一般文化的良性改

① 其“厉害”之处在于，大学体制对文化研究的这种“学科化”要求，是和所谓人才市场的压力紧密结合的，当问“什么是文化研究的学科内容”的时候，实际也就是问“拿文化研究学位的学生毕业后能从事什么职业？”身为教师，我们理当重视学生的就业需求，而如何在切实回应这个需求的同时，避免文化研究的教学在现行的大学体制和“中国特色”的市场体制的双重挤压下，快速变质为一种专业化的劳动力培养，显然并非易事。